图书情报工作
第 64 卷 第 10 期　2020 年 5 月

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姚伯岳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天津 300387

摘　要：[目的/意义]古籍编目是古籍保护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工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 13 年来，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国家层面的足够重视，及时采取有力对策，尽早予以解决。[方法/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提出解决的路径和方法。[结果/结论]我国古籍保护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对古籍编目的特别关注上来，要改进和完善全国性的古籍编目和发布系统，加强对古籍编目人员的重点培养，加强古籍编目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保证古籍编目工作持之以恒地高质量进行。

关键词：图书馆古籍编目　编目格式　著录规则　古籍编目平台　古籍检索平台
分类号：G254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0.004

1　引言

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就是对馆藏古籍进行鉴定、著录、标引和加工。古籍编目是古籍保护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工作，是揭示古籍的形式和内容并使无序的古籍变为有序的过程，更是古籍典藏、阅览、展示、数字化及影印出版等工作的前提条件。

我国政府于 2007 年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迄今已有 13 年了，其中所列的古籍普查登记和建立珍贵古籍名录两大任务都属于古籍编目的范畴，全国各类型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在该计划的实施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如果以为随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渐近尾声，各图书馆的古籍编目也将大功告成，那就太盲目乐观了。相反，我国的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正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甚至潜藏着很大的危机，亟需引起古籍保护界领导层的高度注意，并予以认真的研究和切实的解决，否则会极大地降低古籍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甚至导致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难以为继。

笔者在知网上以"古籍编目"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97 篇文章，其中 1982-1989 年 15 篇，1990-1999 年 10 年 23 篇，2000-2009 年 10 年 67 篇，2010-2019 年 92 篇。38 年间平均每年只有 5 篇多一点，从数量上看似乎呈逐年递长趋势，但总体来看，泛泛而论者多，深入研讨者少；叙述具体事例者多，探讨学术前沿问题者少；具有国际视野、思辨精神和理论指导作用的佳作，更是为数寥寥。

1988 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鲍国强先生的《论古籍著录的客观反映原则》[1]一文，从古籍著录标准化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古籍编目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采用客观反映原则的必要性。

2003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谢琴芳研究馆员的《汉语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管见》[2]一文，以决策者的身份，认真探讨了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下，如何选择古籍文献书目记录的元数据格式，如何建立适应古籍文献编目对象特点的编目环境，以及如何实现资源共享等问题。

2011 年，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国强教授的《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3]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虽然该文对于古籍编目问题并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

上述几篇论文都是具有引领性作用的学术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古籍编目领域几乎看不到这

*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姚伯岳(ORCID：0000-0001-7807-7516)，常务副院长，教授，E-mail：yaoby1963@163.com。
收稿日期：2019-12-09　修回日期：2020-02-12　本文起止页码：28-34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样有深度的研究论文了。这也说明我国的古籍编目工作和研究后继乏人,后劲不足,需要予以特别重视。

2 古籍编目工作面临的困境

透过古籍普查登记和珍贵古籍名录轰轰烈烈工作的表面,如做稍微深入的考察,便会发现,我国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实际上已陷入迷茫之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编目格式与著录规则的选取无所适从

目前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通行的格式标准是基于CNMARC的《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4],但除一些大型古籍收藏机构,大多数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不懂MARC格式,不能也不愿利用本馆采用CNMARC格式的编目系统进行古籍编目。在目前很多图书馆将普通图书的编目业务都交给外包公司、本馆甚至丧失了编目能力的情况下,更难苛求古籍编目人员进行CNMARC格式的古籍编目。

1995年3月,美国联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在美国俄亥俄州小城都柏林,提出一套元数据的元素集(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 Set)用来描述网上的信息,这套元数据被称为"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元数据,简称DC元数据。DC元数据格式与计算机网络环境和技术更相适应,并将著录部分和检索部分合二而一,使对象的著录更加快速和简洁,检索更便利,据之设计的著录界面简单直观,很快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

DC元数据对我国的古籍编目产生了很大影响。2014年4月1日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古籍元数据规范》[5],同年出版的作为"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成果"之一的《国家图书馆古籍元数据规范与著录规则》[6],其著录事项都是基于DC元数据而加以扩展的。实践层面,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于2006年创建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2009年建设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实际上也是以DC元数据为基础而设计的。但DC元数据在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人们只是在"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和"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两个编目系统上被动地实施着其理念和方法,一旦脱离了这两个系统,人们便不知如何将其具体实施了。

除上述两种格式外,许多中小型图书馆还没有实现计算机回溯编目,仍在使用传统的卡片目录或书本目录,或者自制的Excel表格,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著录方法,具体做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文献编目规则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下,基于《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从其最初版本(GB/T 3792.7-87)[7]开始,就奉行客观反映原则;其修订版(GB/T 3792.7-2008)[8]更进而引入完整本著录的原则,以便于古籍书目记录的著录统一和国际共享。但这些做法既不符合传统的古籍编目习惯,也不完全适用于MARC格式之外的其他古籍编目格式,于是出现《古籍著录规则》虽贵为国家标准但却很少被实际应用的尴尬局面。

编目格式多种多样,著录规则不能定于一尊,编目伊始,人们不知应选用什么样的格式和规则,导致图书馆古籍编目思想混乱,造成实际工作中古籍书目编制的各行其是。

2.2 未能密切关注国外文献编目的发展变化,古籍编目理念和技术方法停滞不前

中国之外,欧美各国,东亚日本、韩国甚至越南,都有不少中国古籍的收藏,但这些国家严重缺乏能够对中国古籍进行编目整理的人才,常常需要从中国聘请专家去编目整理其馆藏中国古籍,而中国专家在当地目前只能采用国际通行的编目格式和规则著录中国古籍。事实上,在经历了长期的实用主义的文献编目之后,西方的文献编目学家逐渐意识到西方传统编目思想和方法的局限与不足,开始向编目的学术性转化,重视书目记录本身的价值含量和记录之间的层级关联,其做法越来越像中国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提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1998年,国际图联发布了"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借鉴开发关系数据库常用的"实体—属性—关系"模型(Entity-Relationship模型),通过对实体、属性、关系的研究,揭示书目记录的功能记录。它改变了传统书目记录的扁平化结构,力图建立各书目记录之间、书目记录中各著录对象之间的关系。FRBR的理念促成了RDA的横空出世[9]。

RDA的英文全称为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翻译为中文即是"资源描述与检索"。RDA是《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AACR Ⅱ)的升级产品,其理论基础是 FRBR,是应数字环境的发展而制定的最新国际编目规则,其目的在于满足数字环境下资源著录与检索的新要求,成为数字世界的通行标准。2008 年 1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合作成立了 RDA/MARC 工作组,在其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欧美各国图书馆的编目系统已普遍采用了 RDA 的编目原则和方法[10]。

2011 年 5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又与以语义技术起家的 Zepheira 公司合作开发了 BIBFRAME(The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Initiative),即“书目框架计划”,也曾称为“书目框架迁移计划(The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Transition Initiative)”。其研发目的是支持数以亿计的 MARC 数据转换,并逐步取代 MARC21 等世界各国目前通行的各种 MARC 格式,使得书目数据在整个互联网上得到方便的交换、发布和共享[11]。目前 BIBFRAME 正在不断探索和改进中,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取代正在走向末路的 MARC 格式。

从 FRBR 到 RDA 再到 BIBFRAME,国际图书馆界一直在寻求更加科学合理的编目方法,这势必影响到世界各国图书馆对其所收藏的中国古籍的编目整理。但目前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界很少有人关注国际编目界的这场变革,几乎完全置身事外,更不要说研究对策,探寻我们应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了。这种状况与前二三十年我国古籍编目界积极学习国外文献编目经验,努力向国际标准靠拢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当下的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界出现了缺乏进取、停滞不前的危险倾向。

2.3 分类法的选用莫衷一是

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始终没有产生出一部独立的图书分类法,分类法一直是依附于具体的图书分类目录而存在的。所以即便是曾具有无上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也不能用来类分全部的中国古籍。民国以来也有一些图书馆自编以传统四部分类为基础的分类法,但也都是限于本馆馆藏,缺乏普适性和权威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普及,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更是显得不够用了。一种最简便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添加新的大类,如晚清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增加“丛书部”,变成五部分类法;1899 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李昭炜编撰出版的《大学堂书目》又增加“西学”部,成为六部分类法。2009 年出台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暂行)》采用的也是这种六分法,将全部现存中国古籍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类丛部、新学类共六大部类。该手册第一章“古籍普查登记范围”开宗明义地规定:“凡产生于 1912 年以前,并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行世者,诸如简帛典籍、敦煌遗书、宋辽西夏金元明清时期版印抄写的古籍、古地图、碑帖拓片、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及西学传入后产生的新学书籍等,均在古籍普查登记范围之内。”这个规定明确将 1912 年前印刷的新学书籍列入古籍普查登记的范围之内。《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暂行)》附录的六部分类法虽然没有依附于某一部具体书目,但该分类法没有采用任何现代分类技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完全意义上的分类法。

另一种办法是学习西方图书分类方法,在西方学术体系基础上重新类分中国古籍。例如民国时期引进国际上通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用于类分中文古今图书,相继出现了 30 余部仿杜、补杜、改杜的图书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均以统一类分古今图书为目的,都力图使中国古籍融合于新的分类体系之中。目前国内许多始建于清末民国的图书馆,还在沿用这种分类法类分古籍,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图书馆采用皮高品编《中国十进分类法》类分馆藏古籍,北大馆藏的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则一直保留着裘开明编《汉和图书分类法》的分类号。事实上,利用这些基于西方科学体系建立的分类法类分中国古籍非常困难,弊病很多,很多时候都是勉强为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出现了一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古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为编纂目的的新型图书分类法,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等。其中《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已被证明是中国现行图书分类法中最为合用的一部,于 1981 年正式批准为国家标准的试用本,在中国图书馆界被普遍使用,并不断改进,现已修订出版到第五版。但这些分类法与民国时期出现的各种十进分类法一样,都是基于西方近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制订的,很难十分恰当地类分中国古籍,所以在古籍分类中应用并不普遍。

古籍分类选择分类法问题的难度还在于,分类法

常常是和典藏号联系在一起的,分类法的改变势必牵涉到典藏号的改变,这对图书馆来说是伤筋动骨的大事,谁都不敢擅做变更,于是沿用成法便成为图书馆古籍分类的常态。但古籍分类法选用的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也给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不便。

3 古籍编目平台和检索平台的建设问题

在古籍编目数字化的新时代,古籍编目系统的建立至关重要。美国的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囊括了北美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各种文献信息资源的编目数据,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文献信息编目平台。国外许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都在这个平台上编目,并在其发布平台 WorldCat 上发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统合各种资源的巨大优势,但恰恰在文献资源的编目方面,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编目和发布平台,古籍编目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现缕述如下。

3.1 缺乏一个完善、开放、通行于全国的古籍编目工作平台

中国目前没有一个类似美国 OCLC 的全国通用的图书馆藏资源编目系统,CALIS 联合目录只限于高校范围,全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和其他各种类型图书馆系统都没有基于互联网的馆藏信息资源联合编目工作平台。

在古籍编目方面,CALIS 建设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在高校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由于"211"项目的停止运行,后继乏力,目前只有海内外 30 家成员馆,而且数据库系统逐渐呈现技术老化、缺乏维护的局面,有待于继续投入和进一步扩大规模、改进技术。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虽然早在 2009 年就建设了一个"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但是由于其格式的繁复,加之使用上的各种限制,导致其使用功能单一,发挥作用有限,没有能够进一步成为各图书馆古籍编目的统一工作平台。

3.2 有待建成一个基于古籍联合编目平台的全国古籍联合书目通用检索系统

2014 年 10 月 10 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正式开通,到 2018 年底,累计发布全国 169 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72 467 条,计 6 541 261 册。理论上讲,"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应该是此前已建立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对外发布平台。但据权威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累计完成 2 315 家单位共 260 余万条书目记录[12],数量远远超出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发布的 169 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72 467 条。由此可见,"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还不能说是"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一个对外发布平台,没有体现 2007 年以来全国古籍普查成绩的全貌。

3.3 许多中小图书馆未能提供可以在网络上检索的馆藏古籍电子书目记录

收藏古籍数量在十几万册以下的中小型图书馆,大多不具备利用 CNMARC 格式进行古籍编目的力量,这些馆或者还停留在传统的卡片目录或书本式目录的阶段,或者只编制 Excel 格式的古籍书目记录,供到馆读者检索。馆藏古籍书目记录不能在网上检索,严重限制了这些中小图书馆藏古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有效利用。

4 古籍编目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问题

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从事中国古籍编目的人员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老一辈古籍编目员逐渐凋零,新的人员接续不上;古籍编目的学术研究低迷不振,成果稀少;古籍编目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被世人认知,我国的古籍编目工作前景堪忧。

4.1 古籍编目工作人员日趋减少,后继乏人

就全国乃至全世界而言,目前中国古籍的编目人员严重不足,高水平的古籍编目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举办了大量的古籍保护培训班,其中有不少是以古籍编目为专题的,应该说对贯彻落实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古籍编目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古籍编目需要具备文字学、文化史、古籍版本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具备文献编目的素质,了解国内外各种编目方法最新进展,掌握编目规则、编目技术、主题标引、分类标引等各种知识技能,没有高等院校专门系统的教学,很难培养出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意识到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规范性,自 2014 年起,在全国多个高等院校扶持建立了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培养机制,现已经毕业了几届学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看来,这几所高校古籍保护教学中,古籍编目的教学内容所占分量明显不足,很难培养出有从事古籍编目工作意愿

和真正具有古籍编目素养的学生，不能扭转古籍编目人才匮乏甚至有断档危险的局面。

4.2 古籍编目没有学科支撑，教材建设严重滞后

古籍编目人才培养要从学科建设入手。但是目前在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上，根本没有古籍保护的学科设置，古籍保护只是作为二级学科或专业硕士学科类别中的一个方向在一些高等院校的相关院系中被自行设置，其下位类的古籍编目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子方向，且相关课程的课时又极为有限，这就给古籍编目专业人员的培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古籍编目的教材建设也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人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古籍编目教材，只有一部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古籍编目》，以及1986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内部出版的由廖延唐、曹之编著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其内容陈旧，已不能满足今日的古籍编目工作需求。除上述两部教材之外，迄今30多年，竟然再没有一部新的古籍编目教材或者专著出版，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5 关于古籍编目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经过认真思考，提出如下建议。

5.1 关于古籍编目格式的选用和改进

古籍编目应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国的古籍编目专家不能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应该及时了解国际上文献信息资源编目的最新发展动向，积极参与国外的文献信息资源编目研究，使自己融入国际文献编目的决策圈子，并以独特的视觉和判断获得国际同行的尊重，争取在国际上获得对中国古籍编目整理方法的话语权，使国外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籍得到恰当的整理和利用。

今后的中国古籍编目走向，也许最终会抛弃MARC格式，也不一定采用RDA，最好是尝试采用跨越式发展的方法，直接进入到BIBFRAME或其他更先进的模式，走一条更符合中国古籍特性、更适应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古籍编目的道路。

古籍编目专家应该加强与文献编目专家的沟通、互动与合作，进行相关的研究，其编目理念以及所采用的编目技术也应该具有国际视野，这样才能设计出令人信服的古籍编目中国方案，实现古籍编目数据的国际间共建共享。

5.2 关于分类法的应用

既然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和包括《中图法》在内的各种新型分类法都不能很好满足现存中国古籍的编目分类需要，那么我们能否另辟蹊径呢？

目前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古籍内容情况已基本被全面掌握，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家层面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编纂一部作为国家标准的《中国古籍分类法》。这是关系到我国古籍保护工作长治久安的大事，现在应该也可以提到日程上来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时曾编制过一部融合四部分类法和《中图法》之长的《中国古籍分类法》，虽迄未正式发表，但也可谓是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5.3 关于古籍编目和发布平台的建设和改造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及时将各古籍保护机构的普查数据输入数据库，并完善导入和导出功能，加快建设全国古籍联合书目通用检索系统，及时公布普查成果，实现古籍普查数据在全国范围的开放共享。"[13]这是极为英明的指示。2020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如果及时抓紧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和全国古籍联合书目通用检索系统的建设，是有望完成"十三五"规划布置的任务的。

笔者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完善相关政策，改进工作方法，将现有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改造成为一个统一管理、界面友好、开放给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乃至藏书家个人使用的古籍编目平台。目前该系统除自行著录或套录之外，各种格式如MARC格式、Excel格式的数据都可以批量导入导出。今后也可以充分发挥该系统这一优长，允许各古籍收藏单位在该系统管理中心的配合下批量导入或导出本馆的古籍书目记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可以专门针对该系统设立一个单独的开发运维管理机构，也可以委托一家公司进行商业性运营。如果该建议能够实现，不仅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将我国的古籍编目工作统合起来，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编目格式和著录规则的选取难题、分类和主题标引问题、各类型大中小图书馆古籍编目系统的适用问题，做到一劳永逸、长治久安。

与此同时，还应将现有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真正改造成为"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一个对外发布平台，随时同步体现2007年以来全国古籍普查

成绩的完整面貌。

5.4 关于古籍编目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

第一,应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发起一个调查,统计一下目前全国有多少图书馆有古籍编目业务小组或岗位的设置,全国图书馆专职从事古籍编目工作的人员到底有多少? 掌握这一数据对于今后古籍编目的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第二,加强对古籍编目工作的宣传推广,要像宣传古籍修复师那样宣传古籍编目员,宣传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宣传他们的业绩,宣传他们的高尚品质;要提高古籍编目人员的学术地位,提高他们的待遇,让古籍编目成为一个令人羡慕、景仰的职业。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目前古籍编目工作低手做不了、高手不愿做的困窘局面,才能将最优秀的古籍保护人才输送到古籍编目的岗位上,保证古籍编目的质量,保证珍贵的中华文化典籍长久地被一批真正懂得的人们整理和呵护。

第三,要加强对古籍编目的学科建设研究。古籍编目在古籍保护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古籍编目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是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 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什么? 古籍编目与版本学、目录学、文献编目学、分类法、主题法的关系是什么? 古籍编目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关系是什么? 古籍编目最大的难点在那里? 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这些基本问题目前都极少有人研究,更不要说古籍编目学科的整体建构了。中国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工作缺乏权威理论的指导,缺乏应有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这种局面必须尽快得到改变。

2019 年 10 月,在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了名为“国际视野下的图书馆古籍编目”高级研修班。受该高研班的启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开始设想在全国成立一批“国家级古籍编目中心”和若干古籍鉴定编目传习所,发挥古籍编目老先生或有经验的公私藏单位古籍编目骨干的单兵作用,加强和促进古籍编目人才的培养。同时发挥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作为国际图联保存保护中国中心和 OCLC 编目核心馆的作用,设立系列项目,认真研究古籍编目与国际接轨等相关问题,努力提高古籍编目研究的学术水平。

6 结语

与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保护事业呈现的兴旺景象不相协调的是,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从整体上看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编目格式和著录规则没有得到统一,古籍分类莫衷一是,全国性的古籍编目平台和发布平台未能有效确立,古籍编目人才严重匮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未受重视。我们必须意识到,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恰如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我国古籍保护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对古籍编目的特别关注上来,既要出成果,也要练内功,要改进和完善全国性的图书馆古籍编目平台及其发布系统,加强对古籍编目人员的重点培养,加强古籍编目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为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持之以恒地高质量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永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鲍国强. 论古籍著录的客观反映原则[J]. 图书馆学刊,1988(1):16－19.
[2] 谢琴芳. 汉语文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管见[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49－53.
[3] 王国强. 图书馆古籍整理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5):11－13,24.
[4] 中国国家图书馆. 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古籍元数据规范 =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metadata specifications WH/T 66－2014[S].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6] 肖珑,苏品红,刘大军. 国家图书馆古籍元数据规范与著录规则[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7]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7－87)[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7.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792.7－2008 古籍著录规则[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9] 吴丽杰. FRBR 理念及其对 RDA 的影响[J]. 图书馆学刊,2007(2):130－131.
[10] 周德明. RDA:从理论到实践[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11] 刘炜,夏翠娟. 书目数据新格式 BIBFRAME 及其应用[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1): 6－7.
[12] 周和平. 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2019 年度理事会辅导讲座上的主题报告[M]// 古籍保护研究(第四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1－14.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EB/OL]. [2019－07－30].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6/content_5223039.htm.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s in Chinese Libraries

Yao Boyue
The Academy of Rare Book Preservation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s is the core content and basic work of rare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a Rare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for 13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s in Chinese libraries.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lems are faced.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time to solve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Method/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one by one, the deep-seated causes were excavated, and the way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em were put forward. [**Result/conclusion**]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ext focal point of the rare book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s. We should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cataloguing and publishing system of rare books,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rare books cataloguing personnel,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are books cataloguing, and ensure that the rare books cataloguing is carried in a persistent way and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s: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 in library　cataloguing format　cataloguing rule　rare book cataloguing platform　rare book retrieval platform